

“群众路线”：概念、内涵及其历史演变*

李 华

[摘要]“群众路线”是中国政治理论中的一个独特且重要的概念,被视为中共的重要法宝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共的成长和成功离不开群众路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及中共都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坚持群众路线尤其重要。在此背景下,对“群众路线”一词的内涵和演变进行梳理,有益于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群众路线”;概念内涵;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1-0096-07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是表达一种认识论,也是表达一种组织原则、工作作风和方法^①。群众路线是在中共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长期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自中共诞生至今,“群众路线”这个概念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演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

一、“群众路线”一词的提出及其早期内涵

在1921~1927年间,中共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已对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党领导群众的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和探索。中共从成立伊始,就强调自身区别于一般“研究性的小团体”,要求党“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要能做到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②但1927年以前,中共主要是在城市中进行工人、学生的宣传和组织方面的工作,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共所称的群众主要指的是工人和知识分子,在这两个群体中,群众路线萌芽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建党初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勃兴,初步显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威力。”^③

在这一时期,较之于“向群众学习”的提法,中共更多强调的是对群众的宣传和教育,而非如后来成熟的群众路线所要求的那样,既要做群众的老师,又要做群众的学生,从群众的实践中寻找真理。因此,虽然这一时期中共常常提出和批评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但并没有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忽视“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的结果,中共此时尚缺乏“做群众的学

* 本文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13年度青年教师学术促进会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QCH201302。

① 本文在行文上,涉及“群众路线”概念本身时加引号,此外不加引号,特此说明。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③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生”(尤其是“做农民群众的学生”)的思维和实践^①。国共分裂以及深入农村之后,中共无论是从思想认识还是现实的考量中都要求做到“向群众学习”,“做农民群众的学生”,并逐渐形成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

中共自建立伊始就注重深入群众,强调用群众自己熟悉的方式去教育和组织他们,但这一时期中共更多的是与群众“建立友好关系”,还没有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具体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作风。如1926年4月15日在《我们今后怎样工作》中这样论述“我们今后要深入群众获得群众并巩固群众的统一战线,必须在宣传上及活动上极力矫正过去的错误……要有适合群众要求的口号,才能集聚这些反敌人的势力。如果口号提高了,色彩鲜浓了,使群众畏避,自己陷于孤立,甚或群众反被反动方面吸收过去,更是危险。”^②虽然言辞中仍体现出与农民群众之间难以一时抹去的“隔阂”,但1926年9月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就提出比较接近于群众路线式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做农民运动工作的人,必须注意先使他自己的言语行动生活服饰农民化,而后始能接近农民,使农民接受宣传。……要深知民间疾苦,才能说出农民的要求,要懂得客观可能行动的限度,才能引导农民去斗争……应详细调查该地农民生活状况,习俗,习惯,找到可以接近他们组织他们的方法。”^③1926年9月《妇女运动议决案》中也指出“过去在许多地方,我们都是拿国民党的妇女部,妇女协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机关去活动,去号召群众,但结果多忘记了群众,没有打入群众,而只占据这些机关;……我们根本的责任在‘号召群众’,取得群众,决不是占据机关,形成一种机关运动。因此我们要根本注意群众的工作。”^④显然,这些历史文献表明,在1921~1927年间,中共在使用“群众路线”一词时,主要将其看作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作风,这是其早期的概念内涵。

二、“群众路线”概念内涵的初步完善

1927年国共分裂后,无论是基于解放群众的理想抑或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考虑,中共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走向群众、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在1927~1937年间,中共自始至终都将“党”与“群众”的关系视为革命的中心问题,视为衡量和考察各级党部工作成败的根本标准,虽然这10年间中共经历了三次“左”倾,但即便是“左”倾的中共中央,也没有放弃中共与群众之间在价值和组织层面应有的紧密关联,相反,其更加强调群众对于中共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共走向群众的必要性——虽然不合理的斗争方式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手段和力量。在这一时期,从事实际政治军事斗争的毛泽东更能体会群众对于党的现实意义。1934年初,毛泽东将其对于群众的这种价值取向用经典的话语表述出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⑤这一论述成为中共对群众的价值取向通俗而直接的展现。

这一时期中共在农村地区的革命斗争使其迫切地需要宣传、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占据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群众的解放也成为中共赢得革命胜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928年中共六大将“争取群众”作为总的政治路线(“争取群众的路线”),这一时期,“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

^① 作为群众路线主要创造者的毛泽东较早地肯定了农民群众在中共的正确认识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111~112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214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23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作”成为中共实现其价值理想和解决现实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路径,中共将“充分的群众工作”上升到了“路线”的程度,“群众”和“路线”两个用语逐渐走向统一,“群众路线”这一整体性称谓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并逐渐具备其特有的内涵。

一般认为,正是在1929年9月,周恩来最早将“群众”与“路线”两个用语结合起来,形成了全新的“群众路线”称谓^①。这一称谓是基于中共试图将群众工作“路线化”的努力以及诸如“经过群众的路线”之类的说法而产生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群众路线主要是指“借助、依靠、通过群众”,“公开、广泛地”开展工作。如在1929年9月《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出现的“群众路线”,便是针对筹款过程中“红军”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提出的,即筹款工作必须发动、经过群众,公开广泛地进行,不能依靠军队及其暴力狭隘地进行。同样,1930年5月《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提出“反帝国主义必须是公开的号召,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才能团结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国内一切少数民族,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绝对不能束缚在党的狭小范围内,否则是极大的错误。”^②这里的“群众路线”也主要是“公开的、群众的而非狭小的、秘密的和少数人”的意思,因此,这里虽然将“群众路线”作为明确的工作准则提出来了,但仍未赋予其丰富而独特的内涵。至1933年,“群众路线”这一称谓已经正式化和约定俗成了,其主要表现为此时中共提出群众路线称谓时已对其加上引号,进行强调和特指,如1933年11月《中共中央局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给苏区各级党部指示信》中就提出“没收分配的斗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方式,充分运用‘群众路线’。”^③

中共的工作重心在这一时期逐渐转向农村,中共党内农民成分的急剧增加使中共中央感到“农民意识”已经对中共的先进性和工人阶级基础造成了侵蚀,“过去党内的生活大部分以全力致力于农民暴动的工作,对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观念不甚坚决,所以有意和无意中忽略了城市职工运动的工作,……因为现在中国的党员成份十分之八九是农民,所以许多党部的行动差不多跟了农民的意识走。”^④为此,党采取的方式是增强无产阶级的成分,减少农民成分以及消减农民意识等。

当然,这一时期中共并非没有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及从中共领导群众的具体斗争中形成正确认识的重要性,1929年6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案》中就指出“若没有对于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理论与策略,决不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任务。当然这样的理论的教育,要注意与实际斗争策略,党的日常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离开策略,离开工作去高谈理论,这是一种清谈的倾向。这不只是使同志得不到正确的政治认识,而且是妨害党执行在目前革命当中实际任务的最恶劣倾向。”^⑤将这一探索深化的,则是毛泽东。毛泽东虽然也认识到远离城市无产阶级会给中共带来不良的意识倾向,会削弱中共的先进性基础,但他并没有诉诸中共

^① 对于中共“群众路线”称谓(只可认为是初步的“提法”和“用语”,而非完整意义上的“概念”)产生时日的考据与争论,见施光催《李立三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4期)及王德木《周恩来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2期)。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由此,如果1929年可以作为群众路线称谓产生的时间,那么1933年则可以作为群众路线称谓正式化和约定俗成的时间,《剑桥中华民国史》亦将1933年作为群众路线清楚形成的时间(参见[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1933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关节点,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江西以及“围剿”背景下“群众工作”的紧迫性与现实性,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共经过前十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已经在群众工作上有了具体的进展和理论的总结。此外,更为重要的是,1933年毛泽东有关群众工作、调查研究和反对教条主义的论述和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自身的理论、实践探索中得到了初步的阐发和运用。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与群众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带来的中共作为现代政党的必然先进性,他也没有将外来的“本本”当作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圭臬。毛泽东更加强调中共从“群众的实践”中去获得正确的认识,发现真理——当然,如同毛泽东后来所经常强调的“甘做群众(主要是基层的农民群众)的学生”之类的说法,他的这种认识方式并不是“回归农民意识”,而是在中共和农民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一种交流,并且通过对这种交流的汲取、整合和深化来获取正确的认识,同时认为单靠农民群众自身,而没有中共作为现代政党的存在,认识过程是无法进行的。^①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群众路线认识论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其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上,更表现在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上。在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的解决方法应该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②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更加鲜明地反对只依靠教条和本本,脱离群众和群众的实际斗争与生活的认识现实的方式,他首先批评道“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③因此,毛泽东强调,解决现实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从群众中、从现实中找到各种“材料”,当党员干部通过调查研究,通过走出机关,深入群众的方式获取群众的和基层的最直接的各种材料时,才可以称得上形成了对于现实的正确认识,也便可以依据这一正确的认识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④

由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共的上级机关的认识和指示的正确性不在于其作为上级机关自身的地位,而在于其能否贴近现实和群众的需要,基层的群众在很多时候比党员干部更了解客观实际,乃至更具智慧,“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⑤为此,只有贴近群众和现实的认识才能够深入群众,才能使中共不至于脱离群众,进而更好地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完成各种任务,“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⑥

在1927年至1933年间,毛泽东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1931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⑦的口号,这就意味着中共仅仅依靠自身的知识、阶级成分或者远离实际的各种理论和指示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都无法使其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革命现实,反对教条和本本不仅要在理论上打破它,更需要通过党员干部实际的调查研究成果来

① 毛泽东的这一创造既源自现实的压力又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现实的压力使作为基本群众的农民的重要性越发提高,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则使毛泽东没有完全地回归农民意识,抹煞党的先锋队色彩。“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最初进行的工作是组织城市工人。为什么又以农民斗争为中心了呢?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思想发展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环境变化的结果好一些。同样,我想他重视军事方面,提出农村根据地理论等,也都不是理论发展的结果,而是革命运动所处的环境产生了那种观点。然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那种新观点和新经验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前提。他从30年代后期就通过延安时代逐渐改变了他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美]本杰明·史华兹、[日]中嶋岭雄《美日学者对谈录——关于毛泽东思想起源问题的讨论》,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论毛泽东》第二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页。

补充、修正乃至替代各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指示。

总之,在毛泽东的努力和示范下,中共对“群众路线”概念内涵的认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得以初步形成,其主要表现为从群众中、群众的实践中获取材料,经过中共的理论整合,形成正确的认识,并最终成为指导群众实践的思想。

这一时期中共的群众工作在现实压力下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因此较之前一时期,中共更加关注在群众工作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如“盲动主义”、“军事投机”、“命令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看到了这些不当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阻碍中共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使中共脱离群众,“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中共脱离群众的。”^①而中共脱离群众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替代群众”和“不顾群众”,因此,中共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就指出“共产党……应当严重反对知识分子藐视群众无知识无文化而自骄自傲的态度。应当严厉的反对工会工作者‘替代群众’,‘不顾群众’而擅自决定一切问题的企图。对于这些现象应当毫不容情的肃清。”^②显然,中共虽然是比群众先进的领导者,但正确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并不是只依靠中共做决定和执行任务,相反,中共应该教育群众,说服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取得群众。只有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命令’的关系,共产党必须坚决肃清这种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传染病,才能真正取得千百万群众。”^③

此外,较之前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共在现实的工作中已经逐渐地将群众工作的作风和方法系统化、原则化和理论化了,这首先表现在中共提出群众工作应该“到群众中去”,“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④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与经过群众”,“……集中火力向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开火,……一切决定的执行,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与经过群众。”^⑤其次,这一时期,中共将正确地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上升到了“工作路线”的高度,将群众工作中脱离群众的错误视为“非群众的工作路线”,1929年6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职工运动决议案》在谈到海总工作时就提出“改正海总非群众的工作路线。由下而上建立群众的组织,充实海总下层群众的基础,纠正过去机关式包办式命令式的工作方式,要运用组织的形式来领导群众的斗争。”^⑥

最后,这一时期,中共已经明确提出了作为工作方法和作风的“群众的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概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315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384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615~616页。作为较早关注党的群众工作的领导人,张闻天指出不仅要教育和说服群众,还应向群众学习“要使我们党真正能够变为群众的领导者,我们不只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76~377页)

④ 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735页。这一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提出了类似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如李立三在1929年提出“做群众工作,是要到群众中去,是要唱群众能听懂的调子,才能引起群众的同情,才能使群众和唱起来。决不是坐在外面,唱一些‘阳春白雪之曲’,群众莫名其妙,或许还会以为这是一些疯子,决不敢亲近我们了。”(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670页)在此文中,李立三还提出要完成一本《怎样争取群众?》的著作“至于正确的分析了目前的革命形势以后,自然更迫切需要对于战术与策略以及运用方法的详细的解答,我预备继续写一本《怎样争取群众?》的小册子,来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毛泽东真正将这一目标现实化了。张闻天在1933年也提出“新的领导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现,不是去看这个县委书记是不是在家,各部工作人员是多是少,有无开会的议事日程等等,而是要看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要看党是否能灵敏的反映下面的群众情形,很迅速的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响应党的每一号召。”(张闻天《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第373页)

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第68页。

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313页。

念,并作为特定的原则来指导中共的群众工作。“新区边区的党在领导方式上最基本的弱点是不会运用‘群众的路线’,在没收分配土地,肃反等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不会发动群众参加,许多地方只是少数工作人员直接的干,日常工作也是这样,干不通时,便强迫命令群众,或则消极起来,坐在机关里叹气。这种领导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当然是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不能起来的,只有自己干,……所以要使党的领导能够充分的运用‘群众路线’就必须努力组织群众的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工会,青年团和贫农团,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党的每个口号经过自己的党团去动员各种群众组织。”^①

这一时期,随着中共的工作重点逐渐从城市转入农村,作为一种组织原则的群众路线不仅仅体现在中共党内,苏维埃政权亦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和运作起来。中共的组织自身非常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这一组织原则,虽然在现实的压力下,中共必须强调自身的巩固、统一和团结,强调在铁一般的纪律下塑造党的力量,但是只要现实情况允许,党内的民主主义依然受到重视,党内的选举、普遍的讨论以及自下而上的了解和监督也尽可能地得到推行。1928年初,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党内民主的意义:“1、要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2、尽可能的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3、尽可能的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但决不是要下级负责同志或每个党员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负责同志,决不是要上级机关无权威,一切都要解决于党员群众……。”^②同年7月中共六大的《政治议决案》亦着重强调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③在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党的严格纪律与党内民主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平衡是中共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逻辑,依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中共与党员群众之间就能够紧密结合,能够发挥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双重的积极性,而违背这一组织原则,中共必将丧失党员群众的支持,中共的干部也因失去群众的信任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虽然这一时期中共经历了多次“左”倾浪潮的冲击,使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很多时候难以落实,但中共仍旧将“走群众路线”作为党内纪律和民主实现的理想方式:“对于严重政治错误而又固执不改的同志,我们需要在群众前面指出他的错误,使他的错误观点不能在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不信任他,最严重的惩罚便是公开的消灭他在群众中的政治生命,而不是暗地里消灭其肉体。”^④

此外,伴随着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种政权体系沿用和发展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由此成为苏维埃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和民主形态,这在政权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就表现为苏维埃政权是“群众自己的政权”,政权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群众,政权必须依靠群众的创造、参与和监督,政权权力的行使和政策的落实也必须深入群众和通过群众,并最终为了群众。“苏维埃组织应当采取民主集中制,……苏维埃的群众化是对的,群众化的主要意义是要苏维埃真正由群众产生出来,实际为群众利益而努力,吸收群众中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各部各委员会工作,经常向群众报告苏维埃的工作,……如果有精密计划,正是发挥群众创造精神的动力,如果群众有比苏维埃更好的意见,可提出苏维埃采纳,……这绝不妨害群众创造精神的发展。”^⑤

由此,不仅中共自身的组织和运作必须“走群众路线”,中共所建立的政权也必须“走群众路线”,作为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群众路线在中共和中共所建立的各种组织体系中都得到了广泛的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第390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81~82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320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377~378页。

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第66~67页。

运用。

三、“群众路线”概念内涵的基本定型

以延安时期为中心的1937~1949年间,是中共对“群众路线”概念内涵认知基本定型的时期,“延安时期的许多政策都是在瑞金的最先尝试、并逐渐发展成熟的办法。在理论阐述的支持下,20世纪30年代初的实验性倡议如今已成为完整的操作制度。”^①一般认为,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是“群众路线”概念内涵基本定型的标志,其中所提出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对“群众路线”概念最典型的论述,“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已经成型并延续至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②群众路线概念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定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群众路线认识论的最终形成。作为一种认识论,群众路线强调党的正确认识不源自外来的教条和理论,而源自党员干部对于现实和群众的调查研究,唯有通过中共与群众、认识与实践之间不断的循环往复,才能够形成正确的认识,也唯有这样的认识,才能成为中共指导一切的科学原则,1937年7月毛泽东的《实践论》对于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做了最为深刻的阐述和最为详细的说明,“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以1941年3月、4月发表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等为标志,“群众路线”概念不仅作为认识论在理论上成熟,也通过调查研究的广泛推行,在现实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群众路线进一步地原则化和操作化。这一时期,群众路线理论和概念更加成熟和丰富,成为中共必须遵守的鲜明而根本性的原则,与其概念化和理论化相伴随,这一时期迫切而丰富的群众工作实践也使群众路线具有了更加细致、多样和成熟的操作方式。

最后,群众路线实际作用的有效发挥。这一时期,延安整风创造性地运用了群众路线方式,更加有效地推进了中共的作风建设;在军队建设上,军民之间以及军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群众路线推进了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政权和民主建设中的群众路线既保障了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又赋予群众政治上的主体地位,推动了群众的政治参与;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群众路线既满足了群众对自身利益的现实要求,又使中共的政策和价值不脱离群众,被群众认可和接受。

(本文作者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止耳]

①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② Townsend R. Jam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57.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